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5)05-0077-07

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林善炜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理论研究部,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要]在对凯恩斯开放经济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借用Feder的分析方法,分析动态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考察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对国内非出口部门和静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技术外溢作用,可得出结论:(1)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溢出效应越大,经济发展的效率越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也越大;(2)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比重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对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也越大;(3)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增长越快,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提高也越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也越快。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出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的情况下,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必须通过积极培育先导产业、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优化生产和出口结构,即完成生产和出口结构从初级产业及产业链低端向高级产业及产业链高端的转变。

[关键词] 动态比较优势; 后进国家; 出口贸易; 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4

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出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出口部门的选择,不仅关系到一国短期贸易利得的大小,而且会影响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口部门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选择。选择未来潜在市场需求大、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出口部门,积极创造比较优势,不仅会提高出口部门的竞争力,而且还会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引导产业升级,进而促进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本文拟在对凯恩斯开放经济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借用Feder的分析方法,分析动态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考察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对国内非出口部门和静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技术外溢作用,进而提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建议。

一、静态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陷阱

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

与贸易过程中都应该遵循“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在现有条件下(即国内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供给基本不变),一国如果集中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富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1],则可以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比较优势一旦形成,就将长期存在。任何违背比较优势原则、试图利用任何产业政策进行经济干预的行为,都将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增进。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正是在传统贸易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各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但在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下,各国间的分工往往呈现两极分化的格局: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等优势占据有利位置,从事高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并在这些高附加值的部门确立比较优势;后发国家则由于先天的不足,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往往只能从事低技术产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并在长期的分工与贸易中形成静态比较优势,而在高技术、高

[收稿日期] 2015-05-20

[作者简介] 林善炜(1969—),男,福建省大田县人,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国际贸易。

附加值领域长期处于比较劣势地位。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坚守静态比较优势,意味着长期锁定在低价格弹性、低利润率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这不仅会影响后发国家的贸易利益,导致后发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长期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种分工模式的继续,后发国家高能耗、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也进一步延续:出口能耗大、高度依赖于原材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污染本国的环境^[2],浪费本国的资源,换取微薄的利润和工资报酬,让发达国家享受后发国家生产的低成本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也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也就越严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也就越突出。^[3]长期坚持这种低效型发展方式,让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高消耗,无疑是换取短期利益的“慢性自杀”^[4],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具体而言,静态比较优势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从负面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

首先,静态比较优势容易导致后发国家陷入低水平陷阱,出现巴拉萨所说的“贫困化增长”^[5],而“贫困化增长”又反过来使得低效型发展方式无法改变(如图1所示)。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后发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但其需求弹性比较低,从长期来看,其价格有下降的趋势。此外,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单位价值量比较低,生产商一般只能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才能增加收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度增长虽使其出口能力大增,但又会进一步促使其出口价格下降,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虽然可以通过提高产量来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应(比较 S_1 和 S_2),但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本国实际消费水平 C_2 还不如经济开放前自给自足的消费水平 C_1 ,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也出现下降(比较 U_1 和 U_2 两条无差异曲线),从而导致陷入低水平陷阱。由于产出效率低,后发国家只有扩大生产和出口规模,才能维持一定的产出增长,而这个过程同时也使得低效型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地延续。

其次,静态比较优势导致产业结构锁定在低端领域,技术进步缓慢,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低下,从而使后进国家陷入低效型发展方式。静态比较优势强调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忽视新的、潜在的比较优势的培育,鼓励资源往比较优势大的部门转移。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进行国际分工与合作,虽然

企业可以通过“干中学”和“出口中学”等途径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但同时也放弃了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提高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机会。由于“干中学”只是在原有技术框架下求微小进步,其效应是有限的,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日趋衰微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只能根据现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其技术进步及其速度对生产效率的贡献是有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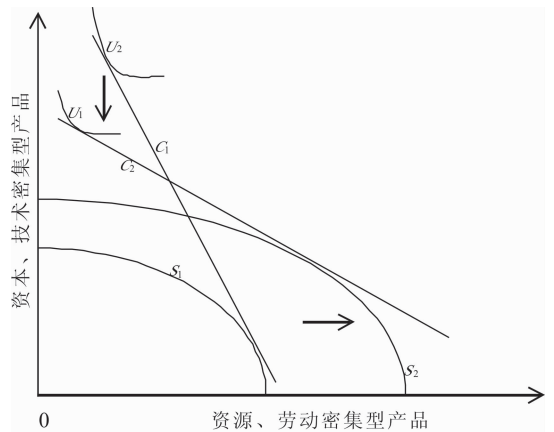


图1 低水平陷阱与贫困化增长

再次,静态比较优势容易导致忽视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化,人力资本逐渐取代资源、资本和普通劳动力而成为最为关键的要素,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片面强调现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较为低级要素的使用,而忽视人力资本要素的培育,特别是忽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如卢卡斯所言,各国如果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即初始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专门从事学习效率高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初始人力资本缺乏的国家专门从事学习效率低的低技术产品生产,那么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会在专业化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生产技能和经验,并获得比封闭状态下更高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而人力资本缺乏的国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封闭状态下的情形。^[6]

总之,后发国家如果完全按照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选择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生产,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分工利益,但会面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贸易利益无法保证的局面。过分强调发挥现有优势,会使得后发国家长期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丧失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追赶的动

力,导致其经济发展方式处于长期落后的局面。

二、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战后,世界各国纷纷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以日本、韩国为首的一些亚洲国家迅速崛起,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很多学者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Krugman等^[7-8]相继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认为“东亚奇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国家动态比较优势战略的成功实施,即通过补贴和保护政策等,对某些产业进行重点扶持,促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动态比较优势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动态比较优势强调在开放和竞争中提高竞争力,而贸易保护主义则认为对某一产业的保护应该关起门来进行。然而,在很长时间内,尽管人们在很多场合提到动态比较优势,但并没有对何为动态比较优势形成统一的认识,这或许是由于这些亚洲国家获得成功的背景和具体途径各异,也或许是因为学者们对东亚各国发展原因的看法不一。

Redding^[9]首次将动态比较优势定义为:一国在时点 t 上实现 i 部门生产的机会成本增长率比其他国家更低,则该国在时点 t 上关于 i 部门的生产活动就具有动态比较优势。Redding的这一定义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并被很多学者加以引用。但他的定义仍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他更多地强调后发国家如何通过降低机会成本增长率,使某些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动态地获得比较优势。可以说,这一认识,并没有突破世界现有的产业格局。实际上,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们需求的日益差异化,很多新的产业会层出不穷地涌现,后发国家更应该将目光投放到那些尚未被开发的领域,而不是仅仅依靠“干中学”去获得某项学习效应有限的产业动态比较优势。此外,Redding的定义似乎有一种“马后炮”的味道,因为他只回答了动态比较优势“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回答哪些产业可以培育成为动态比较优势,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实现动态比较优势。

笔者认为,动态比较优势是立足于未来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而主动培育的一种潜在优势,即产业的选择应该面向未来的潜在市场需求,通过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帮助,鼓励企业进入,发挥领先者的优势,先发制人,积极创造和培育全新的比较优势。

这种优势不仅仅是在某一时点上获得的生产成本优势,更是一种以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累等为支撑的竞争优势。动态比较优势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靠产业保护就能简单实现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在要素禀赋结构动态升级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专门要素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结果,其目的是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培育新的要素禀赋,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动态升级,进而引起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和出口部门的优化。

静态与动态之区别,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战略选择着眼点的不同所导致的。按静态比较优势还是按动态比较优势进行资源配置,既是一个发挥比较优势抑或获取潜在优势的两难选择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重当前利益或重未来发展的权衡取舍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源禀赋参与国际分工贸易,虽可以获得交换利益和专业化利益,但不利于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而着眼于未来发展的角度配置要素资源,表面上看,损失了当前的贸易利益,但可获得未来的先进生产力,实现在未来某个时点上对发达国家的超越,甚至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贸易理论引领着贸易实践的进程,而贸易实践又反过来检验贸易理论的适用性。任何一个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其应用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选择什么样的贸易理论、什么样的贸易战略,必须与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外贸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在同样的理论指导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就二战后各国的贸易战略及其效果来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动态比较优势战略的贸易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完成了经济发展的飞跃,但这种现象在同样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的拉美国家中并没有出现。很多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将东亚国家近几十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称为“亚洲奇迹”,认为这是个谜。实际上,认真分析东亚国家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背景,可以发现,两者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可以说,正是这种背景差异,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也为是否应该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提出了一个时机标准,即产业结构是否已经进入工业主导阶段?本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否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本国是否有足够大的市场,或者本国的出口贸易是否已经发展到较高阶段?很显然,在这些方面,众多拉美国家都存在不足,或者说贸易战略转

变的时机还不成熟。

三、动态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

发展战略的选择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效果。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强调发挥现有资源禀赋的静态比较优势战略,往往意味着现有资源要素的过度开发,而对更重要的动态要素,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和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能力等重视不足。以这一战略为指导,容易导致经济发展过分追求短期利益增长,忽视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容易导致经济陷入 Krugman^[10] 所言的“投入驱动型增长”,即高经济增长率与低资源利用效率、低产出效率并存,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日益突出,有损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这种战略及其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不是一国长期发展的最优选择,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发展方式完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出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调整出口结构,即通过比较优势部门动态变化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 基于出口分类的三部门模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拉动经济发展“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之一的出口,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 16 世纪,重商主义学派就认识到出口贸易的重要性,指出应该通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等措施增加本国的货币和财富。从 18 世纪中后期开始,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进一步提出了分工与贸易的思想,更加明确指出一国应该如何参与国际贸易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福利的改进。在经历了 1920 年代末开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鼓励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开始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凯恩斯对整个经济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做了全新的梳理,认为按总需求划分,国民经济可以分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四个部门,国民收入恒等式为: $Y = C + I + G + (X - M)$ 。此后,很多学者在凯恩斯的开放经济四部门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常见的方法是将上面等式左右两边分别对时间求导,其结果为:

$$\dot{Y} = \dot{C} + \dot{I} + \dot{G} + (\dot{X} - \dot{M}) \quad \text{①}$$

对①式进行简单运算可得:

$$\frac{\dot{Y}}{Y} = \frac{\dot{C}}{C} \cdot \frac{C}{Y} + \frac{\dot{I}}{I} \cdot \frac{I}{Y} + \frac{\dot{G}}{G} \cdot \frac{G}{Y} + \frac{\dot{NE}}{NE} \cdot \frac{NE}{Y} \quad \text{②}$$

其中, $NE = X - M$ 为净出口, $\frac{\dot{C}}{C}$ 、 $\frac{\dot{I}}{I}$ 、 $\frac{\dot{G}}{G}$ 、 $\frac{\dot{NE}}{NE}$ 分别为各个变量的增长率, $\frac{C}{Y}$ 、 $\frac{I}{Y}$ 、 $\frac{G}{Y}$ 、 $\frac{NE}{Y}$ 分别表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1],各个部门通过乘数作用推动经济发展,出口部门通过贸易乘数的大小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乘数大小为 $\frac{dY}{dX} = \frac{1}{1 - \beta + \gamma}$,其中 β 为边际消费倾向, γ 为边际进口倾向。由乘数等式可知,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 β 成正比,与 γ 成反比。这种分析方法较为直观,数据也较为容易获取,因此长期以来广受学界的青睐,但其存在的缺陷也很明显。根据这种方法,只能测算出整个出口贸易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却无法获知哪个出口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也无法比较不同出口部门对本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作用的差异。在国际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种方法的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因此需要对这一方法进行改进,考虑不同出口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以便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扶持性和抑制性产业政策提供参考。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凯恩斯的开放经济模型作适当调整,按总需求划分,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三个部门统称为国内部门,与此相对应的是将贸易部门称为国外部门。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出口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差异,将出口部门划分为基于现有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而进行生产的静态比较优势部门和基于未来潜在市场需求、对国民经济具有先导作用的动态比较优势部门。这两个出口部门除了通过外贸乘数促进经济增长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生产率差异和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国内部门,引导资源在各部门间的优化配置,促进整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各部门间的作用机理见图 2。

2. 基本机理分析

在对凯恩斯开放经济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本文借用 Feder 的分析方法,考察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对国内非出口部门和静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技术外溢作用。假设经济存在如上三个部门,由此可得出如下公式:

$$Y = N + S + D \quad \text{③}$$

其中, Y 代表总产出, N 表示国内非贸易部门的

产出, S 表示静态比较优势部门的产出, D 表示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产出。

由于要素生产率存在着差异,因此各个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假设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具有技术外溢效应,动态贸易部门对静态贸易部门也有技术外溢效应,三个部门的生产率不同,由此可得出各自的生产函数如下:

$$Q_N = F(L_n, K_n, \gamma_n^s, \gamma_n^d) \quad (4)$$

$$Q_S = G(L_s, K_s, \gamma_s^d) \quad (5)$$

$$Q_D = H(L_d, K_d) \quad (6)$$

$L_i, K_i (i = n, s, d)$ 分别表示各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投入, $\gamma_n^s, \gamma_n^d, \gamma_s^d$ 分别表示 s 部门对 n 部门、 d 部门对 n 部门、 d 部门对 s 部门的外溢效应。假设生产要素总量全部用于这三个部门的生产,可得式⑦:

$$L = L_n + L_s + L_d \quad \partial L = \partial L_n + \partial L_s + \partial L_d \quad (7)$$

假设三个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且满足:

$$\alpha_s / \alpha_n = \beta_s / \beta_n = 1 + \delta_s \quad (8)$$

$$\alpha_d / \alpha_n = \beta_d / \alpha_n = 1 + \delta_d \quad (9)$$

其中, $\alpha_n, \alpha_s, \alpha_d$ 分别表示三部门劳动力边际生产率, $\beta_n, \beta_s, \beta_d$ 分别表示三部门资本边际生产率。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出口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高于国内非出口部门, $\delta_s > 0, \delta_d > 0$; 此外,动态贸易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高于静态贸易部门,因此满足 $\delta_d > \delta_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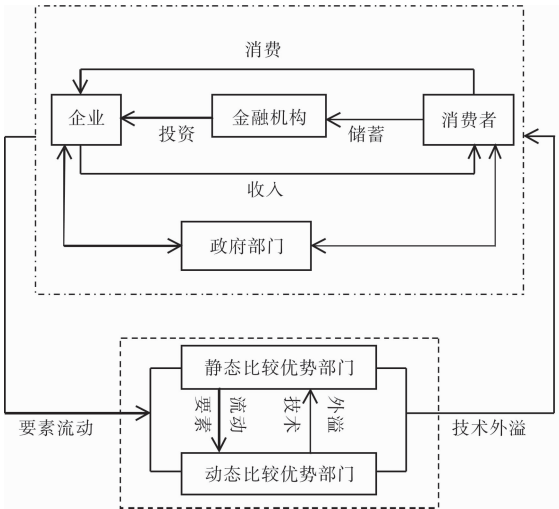


图2 动态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

分别对③④⑤⑥等式两边求微分,可得:

$$\partial Y = \partial N + \partial S + \partial D \quad (10)$$

$$\partial N = \alpha_n \partial L_n + \beta_n \partial K_n + \gamma_n^s \partial S + \gamma_n^d \partial D \quad (11)$$

$$\partial S = \alpha_s \partial L + \beta_s \partial K_s + \gamma_s^d \partial D \quad (12)$$

$$\partial D = \alpha_d \partial L_d + \beta_d \partial K_d \quad (13)$$

根据⑩~⑬式进行整理可得:

$$\begin{aligned} \partial Y = & \alpha_n \partial L_n + \beta_n \partial K_n + \gamma_n^s \partial S + \gamma_n^d \partial D + \alpha_s \partial L_s \\ & + \beta_s \partial K_s + \gamma_s^d \partial D + \alpha_d \partial L_d + \beta_d \partial K_d \end{aligned} \quad (14)$$

由⑦⑧⑨⑩式可知:

$$\begin{aligned} \alpha_n \partial L_n + \beta_n \partial K_n = & \alpha_n (\partial L - \partial L_s - \partial L_d) + \\ & \beta_n (\partial K - \partial K_s - \partial K_d) = \alpha_n \partial L - \frac{\alpha_s}{1 + \delta_s} \partial L_s - \\ & \frac{\alpha_d}{1 + \delta_d} \partial L_d + \beta_n \partial K - \frac{\beta_s}{1 + \delta_s} \partial K_s - \frac{\beta_d}{1 + \delta_d} \partial K_d \end{aligned} \quad (15)$$

将⑮式代入⑭式,可得:

$$\begin{aligned} \partial Y = & \alpha_n \partial L + \beta_n \partial K + \frac{\delta_s}{1 + \delta_s} (\alpha_s \partial L_s + \beta_s \partial K_s) + \frac{\delta_d}{1 + \delta_d} \\ & (\alpha_d \partial L_d + \beta_d \partial K_d) + \gamma_n^s \partial S + \gamma_n^d \partial D + \gamma_s^d \partial D \end{aligned} \quad (16)$$

将⑫⑬式代入⑯式,可得整体经济边际产出 ∂Y 与静态比较优势部门边际产出 ∂S 、动态比较优势部门边际产出 ∂D 之间的关系如下:

$$\begin{aligned} \partial Y = & \alpha_n \partial L + \beta_n \partial K + \left(\frac{\delta_s}{1 + \delta_s} + \gamma_n^s \right) \partial S + \\ & \left(\frac{\delta_d}{1 + \delta_d} + \frac{1}{1 + \delta_s} \gamma_s^d + \gamma_n^d \right) \partial D \end{aligned} \quad (17)$$

其中, γ_n^s 表示静态贸易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和动态贸易部门的外溢效应, $\frac{1}{1 + \delta_s} \gamma_s^d + \gamma_n^d$ 表示动态贸易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和静态贸易部门的外溢效应, $\frac{\delta_s}{1 + \delta_s}$ 和 $\frac{\delta_d}{1 + \delta_d}$ 分别表示静态贸易部门和动态贸易部门的要素产出效率差异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

⑰式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不仅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有关,还与三个部门的要素生产率差异以及出口部门的外溢效应大小有关。由⑰式可得定理1。

定理1 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溢出效应越大,经济发展的效率越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也越大。

动态比较优势部门是以未来的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技术创新创造优势的部门,它不仅引领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而且还通过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带动静态比较优势部门和国内非出口部门的发展。 $\frac{1}{1 + \delta_s} \gamma_s^d + \gamma_n^d$ 越大,即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溢出效应越大,则对其他部门生产效率的影响也越大,因此对整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也越明显。

根据 Bruno 和 Feder 的假设,一个给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人均劳动力产出存

在线性关系^[12],即:

$$\alpha_n = \alpha(Y/L)$$

同时,我们对资本边际生产率作对称性假设,即满足:

$$\beta_n = \beta(Y/K)$$

则⑰式可表示为:

$$\partial Y = \frac{\alpha Y \partial L}{L} + \frac{\beta Y \partial K}{K} + \left(\frac{\delta_s}{1 + \delta_s} + \gamma_n^s\right) \partial S + \left(\frac{\delta_d}{1 + \delta_d} + \frac{1}{1 + \delta_s} \gamma_s^d + \gamma_n^d\right) \partial D \quad ⑱$$

对⑱式两边同时除以 Y, 并进行简单运算, 可得:

$$\frac{\partial Y}{Y} = \frac{\alpha \partial L}{L} + \frac{\beta \partial K}{K} + \left(\frac{\delta_s}{1 + \delta_s} + \gamma_n^s\right) \frac{\partial S}{S} \times \frac{S}{Y} + \left(\frac{\delta_d}{1 + \delta_d} + \frac{1}{1 + \delta_s} \gamma_s^d + \gamma_n^d\right) \frac{\partial D}{D} \times \frac{D}{Y} \quad ⑲$$

其中, $\frac{\partial S}{S}$ 、 $\frac{\partial D}{D}$ 分别表示静态贸易部门和动态贸易部门的增长率; $\frac{S}{Y}$ 、 $\frac{D}{Y}$ 分别表示静态贸易部门和动态贸易部门占经济总量的比重。

⑲式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整体经济发展效率与出口部门的构成存在紧密联系。由⑲式可得定理 2。

定理 2 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比重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对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也越大。

由于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静态比较优势部门的,即 $\delta_d > \delta_s$, 满足 $\frac{\delta_d}{1 + \delta_d} > \frac{\delta_s}{1 + \delta_s}$, 这意味着单位要素配置在动态贸易部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高于静态贸易部门。定理 2 说明,资源应该从要素生产率较低的非出口部门和静态贸易部门向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动态贸易部门流动,这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比较优势部门的升级是如何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影响国内非出口部门的生产,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

将⑮式代入⑩式,可得:

$$\partial N = \alpha_n \partial L - \frac{\alpha_s}{1 + \delta_s} \partial L_s - \frac{\alpha_d}{1 + \delta_d} \partial L_d + \beta_n \partial K - \frac{\beta_s}{1 + \delta_s} \partial K_s - \frac{\beta_d}{1 + \delta_d} \partial K_d + \gamma_n^s \partial S + \gamma_n^d \partial D \quad ⑳$$

将⑫⑬⑳式代入⑩式,可以得到如下一个关于 ∂N 的函数式:

$$\partial N = (\alpha_n L + \beta_n K) + \left(\gamma_n^s - \frac{1}{1 + \delta_s}\right) \partial S + \left(\gamma_n^d - \frac{1}{1 + \delta_d} + \frac{\gamma_s^d}{1 + \delta_s}\right) \partial D \quad ㉑$$

仍假设 $\alpha_n = \alpha(Y/L)$, $\beta_n = \beta(Y/K)$, 则㉑式可以变形为:

$$\partial N = \left[\frac{(1 + \delta_s)(\alpha + \beta + \gamma_n^s) - 1}{(1 + \delta_s)[1 - (\alpha + \beta)]}\right] \partial S + \left[\frac{(1 + \delta_s)\left[\alpha + \beta + \gamma_n^d - \frac{1}{1 + \delta_d}\right] + \gamma_s^d}{(1 + \delta_s)[1 - (\alpha + \beta)]}\right] \partial D \quad ㉒$$

㉒式说明,国内非出口部门的生产受静态比较优势部门和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发展的影响。由㉒式可得定理 3。

定理 3 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增长越快,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提高也越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也越快。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动态贸易部门和静态贸易部门的发展都会对非出口部门生产产生影响,影响的途径是通过要素生产率差异和外溢效应的联合作用进行的。当 $\delta_d > \delta_s$ 、 $\gamma_n^d > \gamma_n^s$ 时,即动态贸易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与技术外溢效应都比较高时,满足

$$\left[\frac{(1 + \delta_s)\left[\alpha + \beta + \gamma_n^d - \frac{1}{1 + \delta_d}\right] + \gamma_s^d}{(1 + \delta_s)[1 - (\alpha + \beta)]}\right] > \left[\frac{(1 + \delta_s)(\alpha + \beta + \gamma_n^s) - 1}{(1 + \delta_s)[1 - (\alpha + \beta)]}\right]$$

说明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增长越快,其对非出口部门生产率进步的贡献也越大。这个定理也从侧面证明,资源从非出口部门和静态贸易部门向动态贸易部门转移,是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四、基本结论

在开放经济背景下,一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是选择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还是选择积极创造比较优势,是一个发展战略的权衡问题。这不仅关系到贸易利益的大小,更重要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长期贸易模式及其经济发展方式。遵循静态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虽可以实现当前的贸易利益最大化,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可能导致本国陷入低效率型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动态比较优势,虽然会损失当前的比较利益,但可获得潜在的发展机会,使后发国家摆脱低水平的发展陷阱,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完

成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

创造动态比较优势是一种战略,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通过实施动态比较优势战略,有重点地优先发展一些先导产业,有选择地培育专门要素,有意识地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可以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从而获得动态的比较优势。由于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代表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和生产力先进水平,对其他产业具有较大的技术外溢效应,因此加快发展动态比较优势部门,增加动态比较优势部门的比重,不仅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而且有利于整体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国的贸易模式、长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是由其比较优势决定的。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贸易比重的大小及比较优势部门的分布情况,都会对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必须通过积极培育先导产业、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优化生产和出口结构,即完成生产和出口结构从初级产业及产业链低端向高级产业及产业链高端的转变。

[参 考 文 献]

- [1] 陈利霞,王长义. 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的维护[J]. 商业研究,2005(3):13.
- [2] 张鸿. 关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思考[J]. 国际贸易,2005(9):4.
- [3] 何帆. 进口是贸易战略的另一只翅膀[EB/OL]. (2005-04-21) [2015-05-10]. [http://www. ce. cn/new_hgjj/jjxr/xuerenziliao/200504/21/t20050421_3670483.shtml](http://www.ce.cn/new_hgjj/jjxr/xuerenziliao/200504/21/t20050421_3670483.shtml).
- [4] 杨英杰,杨小科. 包容性增长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超越[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84.
- [5] Bela Balass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visited: An analysis of relative export shares of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1953 - 1971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 Social Studies, 1977(4):327.
- [6]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3.
- [7] Krugman Paul. The narrow moving band, the Dutch disease, 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 Thatcher: Notes on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dynamic scale economi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lsevier, 1987(1-2):41.
- [8] Grossman G M, Helpman E. 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1):43.
- [9] Redding 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Human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 [M]. Oxford Economic Paper, 1999:15-39.
- [10] Krugman Paul. 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3):483.
- [11] 汪浩瀚. 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理论与经验模型验证[J]. 经济地理, 2005(4):449.
- [12] 许和连,栾永玉. 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三部门模型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9):103.